

資訊社會的解構實踐

Derrida、Foucault 和 Baudrillard 的觀點

劉平君

南華大學傳播學系助理教授

pcliu@mail.nhu.edu.tw

摘 要

本文結合 Derrida 的延異概念與 Foucault 的權力觀，並以 Baudrillard 所描繪的現代到後現代圖像為例來看資訊社會的解構實踐。

本文認為資訊社會的訊息川流中呈現著由權力主體／客體（媒體或大眾）所執行，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異來生產意義（權力）的結構差異化過程。此活躍的權力鬥爭和權力流動不是權力的解放，而是總體性權力管治的（再）生產。

資訊社會的符號天空也展示著由空白主體（大眾）所操作，依感覺美學的符號延異來空洞化意義（真實／權力）的解構現象。此純粹差異的延異遊戲才是解放權力的解構實踐，且其並非無機的資訊機器所架構之冷冰冰的生化世界，而是空白主體依感覺來延展符號並綻放出感動與歡愉的活生生世界。

關鍵詞：德希達、傅科、布希亞、權力、解構、資訊社會

[收稿]2010/10/05; [初審] 2011/03/07; [接受刊登] 2011/05/07

一、資訊社會的權力解放問題

「資訊社會」一詞源自於經濟學，Machup（1962）是首位探討資訊科技對社會影響的學者，他以經濟學觀點詮釋知識（或資訊）的生產和分配行爲，1976年 Ball 的代表著作《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和 1977年 Pora 一系列《資訊經濟》的報告，均繼承了 Machup 的觀點，紮下了資訊經濟的理論基礎，從此，工業社會之後爲資訊社會的社會發展概念似乎已成爲社會共識（謝清俊，1992：5）。

資訊社會是 1970 年代人類社會繼農業社會至工業社會後的第三次劇變，其將全球社會經濟帶離十九世紀奠基的產業形式，而朝向以資訊爲主的社會經濟。這並不是說之前的社會未曾使用資訊，而是資訊於現今已成爲生產、消費及權力在全球社會經濟分配的主要原則。此爲工業型社會經濟逐漸轉向資訊型社會經濟的長期轉變，且其亦保留某些工業的本質，就如同工業型社會經濟保留了某些農業社會的經濟本質一樣。（Jordan／江靜之譯，2003：197-200）

然此以資訊爲經濟運作核心的社會不僅是經濟型態的轉變，也帶來了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Jordan（江靜之譯，2003：235）認爲，資訊流動空間的通訊對當權者相當有力，但資訊商品化使那些受地理因素限制的人擁有了讓他們能對抗全球化的菁英的武器。科技權力成爲資訊流動空間最重要的基礎權力形式。

不過，以資訊流動爲主要驅動力的社會運作不僅帶動了權力結構的流動，又可能導引出脫離社會（權力）和人類主體的無生命資訊流。Lash（2002，轉引自唐士哲，2005：101）說，這些「資訊機器」所呈現的資訊，其短暫的使用壽命及快速變遷的特質使得使用者不再具有反思能力，無所不在的資訊雖然克服空間距離與時間隔閡，但也無法累積。資訊社會中的主體不是有機

的個人使用有意義的語言，而是機械性地網路傳遞無生命的資訊流。

換言之，資訊社會是一個權力鬥爭和權力流動的活絡戰場，也可能成爲資訊機器所掌控的冷冰冰的生化世界。而資訊社會所造就的權力抗爭與重組是權力的解放？還是權力從有機的社會結構或主體轉移到無機的資訊機器才是自由的契機？因此，本文試圖探究資訊社會是否帶來了權力解放（自由）？其又於何處、以何種方式實踐？

二、權力結構的運作與解構

資訊社會如何實踐權力解放？首先，本文以 Derrida 的延異概念並結合 Foucault 的權力觀來看權力結構的運作與解構。

（一）權力結構的運作

1. 從 Derrida 的延異概念開始

Saussure 指出符號以差異來運作。Derrida (1973: 129-130) 則認爲符號又總是延遲的，因此，他創造了一個新字—延異 (differance) 來描述符號的雙重運動，即延遲 (defer) 與差異 (differ)：延異一方面指區別、不等的差異；一方面指延遲的置入、間隔和時延的插入，延異中間的 a 有兩種意涵，既指時間的延遲，又指其所造成的分離運動。

Derrida (1981: 8-9) 再進一步說明延異，首先，延異意指（主動和被動）的運動，這種運動因耽擱、委任、暫緩、托付、迂迴、延期、保留而延遲，就此意義，延異並不是先於一個原始和不可分割的在場 (present) 可能性，相反的，在場延遲的基礎是在場被宣稱或被渴求以再現它、它的符號、它的描摹；其次，延異作爲生產相異事物並造就分化的運動，其爲標示我們語言的所有對立概念的共同根源；第三，延異也是生產，是差異性的生產，差異是延異的結果。

上述意指，符號的運作原則是差異和延遲的雙重運動：差異運動是以符號間的區別來生產意義，這使得我們得以藉由符號的差異來辨識符號的意義；但符號的差異又是一種延遲的運動，這又使得每個符號都在延遲著等待可以再辨識自身的其他差異對象。

所以，延異首先指出了意義在場與不在場之同在。符號因差異運作而得以生產意義，這時意義是在場的、固定的、完滿的，但意義被宣稱在場的同時又出現延遲等待再差異的空間，這時意義又是不在場的（absent）、不固定的、空洞的。因而，意義總是既在場又不在場、既固定又不固定、既填滿又空洞、既完滿又有縫隙。

其次，延異標示出矛盾對立、自身與反自身力量之同在，這種相互激起、既是主動又是被動的運動就是所有語言運作的基礎。也正因延異，致使意義會在差異又延遲的相互促動中持續生產和分化。因為意義在場永遠存在著延遲空隙，在這意義不在場空洞的推動下，意義被再生產以使其再在場，並又帶來了不在場空洞而又推動了意義再再生產，意義就在生產又出現縫隙又再生產的過程中，一再地擴散（差異化）。

例如「老師」與「學生」，雖可經由差異而產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意義，但在獲得意義的同時又出現差異延遲的空隙（凡教育行為皆為老師？）而使意義無法完全。於是，再經知識與常識的差異又再解釋「老師是知識的教育者」，但延遲的空隙又出現（知識的教導皆為老師？），又得更進一步再詮釋「系統性知識的教育者」，又帶來延遲空隙（系統性知識？），又得再再差異來獲得意義...。如此，「老師」與「學生」就處於既了解意義（但又不完全），以致一再解釋下去的狀態。

此即 Derrida 為何以 *differance* 一字來描述延異運動，因其標示出差異（*difference*）中所插入的延遲（a），而此延遲非憑空出現，乃來自差異，就像填滿中的永恆空洞一般。也正因延遲縫隙（a）的存在，其又促動差異運作，

以致造就意義的分化與差異化。因此，意義總是在過程中，總是暫時停駐並存有再差異的空隙，而表意實踐過程就是意義不斷差異化的過程。不過，延遲運動所造就的差異化是意義的互文轉換而非重新創造。此意指，在表意活動中意義暫時停駐，然此意義表示與先前之意義有所差異，其為已經互文而有差異痕跡的意義，並在此其中又存有延遲等待意義再互文差異的空間，因而，每一次的表意都是再確定某些意義又再加上新的聲音，意義就在表意過程中不斷地互文差異化。所以 Derrida (1981: 27-28) 說：「延異中的 a 所意含的主動性或生產性表明了差異遊戲中的生產運動，後者既不是憑空出現，也不是銘刻在一個封閉系統中—共時和分類操作可窮盡的靜態結構。差異是轉換的結果，從這點來看，延異概念不相容於結構概念中靜態的、共時的、分類的、非歷史的主題。差異的生產即延異也不是非結構性的，它生產了系統和規則性的轉換，而這轉換在某方面為結構科學留下了空間。」由於意義的生產是動態的，延異運動下的互文差異化使得欲以差異運動而系統化的意義結構永遠無法完全，造就永無窮盡的意義生產，也使意義處於永恆變遷中。援引前例：從以往知識的先修者到權威的專業教育者再到生活全人的培育者，老師的意義一直處於再詮釋的變遷過程中。

但意義的生產也是結構的。延異運動下的互文差異化並非意義的創新，而是老店翻修，總是沿著一種規則和系統，並也總是意義在場的宣稱，一種意義再固定、再完滿的結構化企圖。而也正是在這永恆的流變中，系統化的意義結構持續分化、複雜化和細緻化，並也持續再生產。援引前例，雖然老師的意義從鞭子變成愛心、從知識教育變成生活培養，但也總是與教育、教養、培育有關，故而，老師意義的變遷乃是順從此規則的意義再分化，更是再固定意義的結構化企圖。

換言之，符號世界不是靜態的、共時的、非歷史的結構，而是動態的、歷時、開放的結構。意義總是在表意過程中擴散流變，並持續地分化、複雜

化和精緻化，但這差異化又是沿著舊有的規則（雖然加上新意），而意義的結構化也在持續的意義過程中再確立（不管它能不能達到）。

然而，為什麼意義被（再）生產？又為何意義會互文地沿著一種規則被再固定？這牽涉了權力的運作。

2. 結合 Foucault 的權力觀

就 Foucault 的觀點，權力是一種力量（forces）的關係，力量從不會是單數，其總是與其他力量結成關係。（Deleuze，1998：70）這種權力形式運作於日常生活中，它為個人分類，並以自身的個性（individuality）為其標示，使其依附於他自己的身分（identity），並在他身上強加一種個體必須認可、以及別人可以識別他的真理規律（law of truth）。這是一種使個體（individuals）變成主體（subjects）的權力形式。（Foucault，1983：212）

而權力是一個「管治」（government）的問題。管治指的是個體或群體的行爲被引導的方式，管治就是去構成他人行爲可能的範疇。（Foucault，1983：221）

上述意指，權力是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區別、分類個體，將其轉變成可以被社會中所有人辨識的主體，即標示「你是誰」。力量總是與其他力量結成關係，因此，權力指權力關係，權力分類個體的認識過程是以關係型態來操作。而權力分類與標示個體的主體化過程是爲了帶出該身分的行爲規範，使主體經由辨識與認可身分而被生產出該有的行爲。所以，權力是管治的力量，權力生產（管治）具相互對應關係的行爲規範。例如「老師」「學生」身分，由其對應關係而得以被辨識，並被生產出其身分所對應的關係行爲「教育」「被教育」。此權力存在於與我們有關的客體中—即論述的客體（discursive objects），權力在論述中、並也藉由論述而得以生產；權力存在於我們自身，我們是權力的產物；權力也存在於他人，像是犯人、瘋子和病人，並非他們本身犯罪、瘋癲和疾病，罪與病是爲了控制而建立的論述位置（discursive

positions) (Anderson, 2003: 3)。每個社會中，論述的製造同時受一定數量程序的控制、選擇、組織和重新分配，這些程序的作用在於消除論述的力量和危險，控制其偶發事件，避開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質性。而在我們這樣的社會，排斥程序是為人所熟知的，最明顯和熟悉的便是禁律 (prohibition) — 禁止的語言；另一排斥原則，是區別和歧視，即理性和瘋狂的對立—瘋狂的區分；第三種排斥系統是真理與謬誤之分—真理意志 (Foucault, 1981 / 蕭濤譯, 2000: 2-7)。

論述包含了陳述 (statement)，陳述是論述的原子，即論述的最小單位。論述則是公式化的一組陳述，其最終的、確定的界線範圍。此外，陳述的傳散是有規則性的，此即論述形構 (discourse formation)，一種散佈陳述的系統。

(Anderson, 2003: 8)。換句話說，權力以排斥系統而生產論述的秩序，透由陳述群的傳散規則—論述形構，規約了誰可以說、在何種場合說、說誰、說的概念與策略等如何論述的規則，定義了論述的對象、建立了論述對象的位置，自我與他人就在論述定位中被形塑出來，並也同時生產了權力。

而透由論述規則來定義論述的對象並形塑出主體的過程就是前述分類、命名、標示、規劃行動範疇的主體識別過程，也是主體身分及其行動規範的意義詮釋過程，更是生產權力管治的過程。因此我們可以說，權力透由意義來運作，而權力分類個體是以關係的方式來運作，意義化過程也是以相對 (關係) 意義來完成。

符號以區別對應 (差異) 關係的系統化而建立認識世界的系統化意義結構，其正體現了權力的區別關係系統。例如「老師」與「學生」的權力關係就體現在他們被賦予的相對意義上：「教育者」vs. 「被教育者」。然而，差異運作又同時帶來延遲空隙，並又推動差異再運作，此意義不在場及其造就的意義化過程又如何體現在權力運作中？這就得從權力與自由的關係來看。

Foucault (1983: 221) 認為，權力僅能行使於自由的主體，並僅在他們

具有自由的範圍內。這是說，個體或主體們面臨的是一可能性的範圍，在這範圍內許多行為方式、許多反應和不同的舉止得以實現。在自由的原則上，總存在一種不服從性和某種根本的倔強性，其在權力關係的中心並作為它們存在的永恆條件。沒有權力關係不具備可能的逃脫或逃離的方法。每一種權力關係至少都含有一種鬥爭策略（strategy of struggle），這兩股勢力並不是疊架的，也不失去各自的特有性質，最後也不會互相混淆。（Foucault，1983：225-226）

上述意指，權力與自由同存，權力的行使必須伴隨著自由的可能。而作為權力條件的自由就是權力管治行為範疇中一個允許它種行為實踐的空洞，一個權力監管所無法預期的空隙（容許某種可逃脫的方法、可能性的反應範疇、至少一種鬥爭策略的空間）。此權力空隙來自權力行使，它們同時存在、有著各自的特質、不會相互混淆。於是，權力行使又在不服從的權力空隙推動下，以特定行為實踐、特定鬥爭實踐再填補權力空洞，以再生產權力管治，並又在權力行使中又激起權力空洞又再以特定鬥爭實踐再再填補，權力關係就在這縫隙填補過程中（權力鬥爭）持續分化、複雜化和精緻化，並持續再生產。

意義生產的差異運動體現了權力的區別關係系統，意義不在場的延遲空隙也正展現了不服從的權力空隙。而在意義空隙即權力空隙的推動下，意義差異即權力行使再度運作，造就了意義和權力差異化之流。援前例，「老師是教育者、知識教育者、系統性知識教育者」「老師是知識先修者、權威的教育者、生活全人的培育者」...，其為延遲空隙（權力空隙）促動下老師意義再填補的互文差異化，體現了老師、學校、教育學者、教育官員、家長、學生等相關權力關係的鬥爭與流變，並也是權力（意義）結構的再生產。所以，權力是一種動態的結構化運作，其體現在意義結構的動態運作。而此權力（意義）結構就存在於現代社會關係中並以指涉真實（reality）來運作。Foucault

(1983) 於〈主體與權力〉一文曾強調其研究乃出自對主體問題的關注，而首要之研究即為賦予自身科學地位而將主體客體化的問題。他並指出權力不是附屬而是紮根於社會關係中。因此有三種鬥爭方式：反對支配的形式；反對剝削的形式；反對主從形式，而反對主體屈從是當代社會最重要的鬥爭形式。

現代社會就是以指涉真實來生產意義（權力）的結構差異化過程。因為，生產意義（權力）的符號差異運作必須以宣稱真實（賦予自身科學地位）為基礎，經由意義的真實指涉而掩飾背後的權力痕跡。所以 Foucault (1980:131) 說：「真理 (truth) 無法自外於權力...，真理是這個世界的產物，它由多種限制形式所生產，它引導了權力的普遍性效果，每一個社會都有它的真理政權 (regime of truth) ...。這就是某種論述形式被視之為真，可以使人區別真假陳述的機制和實例，以哪種方式說、誰可以說。」。

總結而言，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異來生產意義（權力）的結構化運作總是被真實不能的差異延遲（意義／權力空隙）所干擾，於是，意義（權力關係）在再固定（權力鬥爭）過程中持續互文差異化，意義結構（權力結構）也不斷分化、複雜化和精緻化，並持續在流變中再生產。此即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機制。然而，在現代社會的真理政權中，解構又於何處？其如何實踐？

（二）權力結構的解構

Derrida (1976: xviii) 認為：「解構由我們的慾望來推動，因為這種慾望本身就是一種永遠差異於(我們總是想要相異於自己的東西)，並且延遲於(這慾望總是無法滿足)，我們自身文本可被解構的結構，因此，解構永遠不會是一種建構、確定的科學，由於延異無所不在的解構力量，解構是一種不斷解構自身的運動。」。也就是說，解構是一種使結構運作永遠無法完成（延遲）的反結構力（慾望）。因為，結構運作必然包含了逃脫結構的結構消解，它們

矛盾同在、相互激起、有著各自的性質、不會相互混淆，所以，解構絕不會是結構化（建構）的企圖。也由於解構，結構一再被延遲又一再運作，造就結構分化、複雜化的差異痕跡，所以，解構是不斷解構自身的運動。其中結構的概念指的即前述運作於現代社會的意義（權力）結構，而解構則為延遲意義（權力）結構的意義空洞（真實／權力空隙）。

而解構所在的意義（權力）空洞正是解放權力之自由所在。Foucault（1983：212）說，當前的抗爭都圍繞一個問題：我們是誰？它們拒絕這些抽象的概念，這些忽視我們作為個體的經濟的和意識型態的國家暴力，也拒絕決定誰是誰的科學的和行政的研究。總之，這些抗爭的目的不是反對這個或那個權力機構、組織、精英或階級，而是反對權力的技術、權力的形式。

Foucault（1983：216）再強調，或許今天的目標不是發現我們是什麼？而是拒絕我們是什麼。我們須想像並建立我們可能是，以逃脫這類政治上的「雙重枷鎖」，即現代權力結構的同時個體化和整體化。換言之，現代權力是個體化運作，其在永恆鬥爭中持續分化和細緻化，並生產出新主體關係、行為範疇和關係型態；而這權力結構也是整體化運作，新關係型態仍是一種新管治型態，仍在權力全面的管治中。故而，權力鬥爭不是抗拒權力而是行使權力，其以更好的「我們是誰」來取代，持續再定義我們，並也持續競逐權力、再生產權力；權力抗拒是抗拒任何權力形式，是拒絕「我們是誰」，是反對任何身分（認識）的賦予，這什麼都沒有的意義空洞才是抗拒，也才是權力解放之所在。

也正因差異與延異看似相似，人們以為差異意義（權力鬥爭）是權力的解放。此二者之混淆來自符號與意義不斷增值與精緻化的動態意異化，也來自無法全然掌握去向的意異之流。所以，我們其實未曾拒絕權力，雖因權力行使而激起不妥協的反權力空間，卻又落入權力的慾望（我們以為是自由之路），落入一再行使權力的權力競逐中。例如「男性」「女性」在權力運作的

分離實踐中被區別出來，開啓了兩性淵遠流長的權力（意義）鬥爭史，而兩性權力角力尚未歇息，「陰陽人」「第三性」「中性」又在權力慾望的推動下擠出屬於它們的權力（意義）位置。此外，「男性」又分化成「娘娘腔」「肌肉男（身體）」「剛鐵男（意志）」「新好男人」...，「女性」又分化成「職業婦女」「家庭主婦」「女強人」「男人婆」「女人中的女人」...，這嬉嚷熱鬧的主體認同讓我們產生自由解放的錯覺，但它們仍是性別權力結構中的主體位置，並再生產出依男女兩性運作的性別權力結構。

因此，在現代社會以真實宣稱而建構系統化意義（權力）結構並又帶來解構性的意義空隙（真實／權力空隙）而一再固定意義（權力鬥爭）的權力管治複雜分化路程中，我們其實該反向而行，即企圖顯現意義（真實）空洞以消解權力結構，並進入一再空洞化意義（真實）且消解權力管治的路途。

但如何實踐？解構就是以符號延展彰顯無（延遲空洞），即符號置換不在生產意義（真實／權力），而在實踐無意義（無真實／權力）。所以，Derrida 說：「因此必須放棄哲學和科學的論述（discourse），即放棄認識，因為認識有一種回到發源地、回到中心、回到基地、回到原則等等的絕對要求。」（Derrida，1978：286）「從符號學內部改變這些概念、置換它們，使它們轉而對立於它們的預設，把它們再納入其他鏈條中，逐漸地變更我們的工作領域，並創造出新的輪廓。...決裂必然會再被納入舊結構，因此這種結構應該不斷地被分解」（Derrida，1981：24）。

換言之，解構之所以做為一種邏輯，是由於所留下的不是本質形式的規則，而是以一種開放性的策略運用，將所有發生事實的無限空間揭露出來。所以在沒有本質的情況下，Derrida 會說解構邏輯所呈現的是一種散播，去肯定（affirm）一切而不加以形構（constitute）之。也因此，它有所表現，卻沒有位置可言（蔡錚雲，2006：118）。

但我們如何操作純粹差異（無意義）的符號延展？純粹差異本身是由藝

術家生命力量創造的多層性來締造（蔡錚雲，2006：207）。而所謂藝術，在於強調一種直覺（intuition）上的感動，理智上的反省思維對藝術的創造來說反而是一種干擾。這種感動和慎思明辨同樣意義深遠，但表現出來的樣態卻截然不同。一個是不知所的油然而生，一個是深知所以的戒慎恐懼著（ibid：189）。因此，符號延異的解構之途是由感覺來驅動——一種啓蒙以來被理性壓抑卻非其對立面的感官直覺或美學感動（所以將它們劃掉以表示其與啓蒙理性下的感覺有所不同¹）。

Foucault（1983）認為權力運作是以分離實踐而將主體客體化。因此，現代社會的權力區別關係系統下有相對於思想、反省、精神、智識而為感覺、直覺、感官、美學的主體實踐。但這感覺（感覺直覺、美學感動）並非感覺——（感官直覺、美學感動），或說後者其實未曾實踐過。因為前者是理性化的感覺、意義化的感官直覺和美學感動，其為彰顯位於中心與常態之理智而為邊陲與異端之感覺、也是在意義化（權力）機制下與中心抗爭而從事權力鬥爭並再生產權力管治的感覺。

然此感覺究竟為何？其又如何可得？被理性所壓抑的感覺是一種無法言說、卻可以有所表現的直覺美感：它其實很簡單，因為我們習以為常地一再固定意義，隨著意義在場出現的意義裂縫也必然潛藏於我們的基因蠢蠢欲動；它又很困難，因為被理性制約的心靈會一直壓抑它的出現。換言之，這是一種回歸主體自身的感覺。所謂主體，非指自由主義下以主體之名行剝削自然和他人之實的自由主體，亦非批判理論中具階級意識而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異化和物化主體的批判主體，因其皆為現代社會之權力機制所建構的權力主體（客體），以宰制和抗爭執行著權力結構的差異化運作。

依感覺而從事符號延異遊戲的主體是空白（spacing）主體。Derrida（1981：29）說：「主體唯有在與自身分離、變成空間、延緩時間與延遲中才能構成。」亦即，主體的「存有」需藉由其「一無所有」來獲得，主體的「在」乃透由

其「不在」而成全，這「不在」就是空白所指向的延遲空隙。唯有空白主體，以其自我構成的符號延異遊戲來展示自我的空白，才能脫離行使權力同時也受權力管訓的主體，也才能喚回早已失去的主體自身；也唯有空白主體，才能依感覺而操作純粹差異的符號延展，實踐空洞化意義（真實）而消解權力管治的解構之道。

此即 Foucault 晚年提出的主體化遊戲。Foucault 認為主體反而應從其「自我構成」的要求來理解。Foucault 所要展示的是，做為自我關係的主體性如何引入一種主體化的遊戲，而此主體化的遊戲便與治理性的遊戲及真理的遊戲產生交織。然而在這些遊戲的複雜性中（在他們的遊戲中），自由的可能便爆發出來（Gros／何乏筆等譯，2006：146-148）。因此，那來自空白主體的感覺無法被說出，只能被感覺，只能回到符號延異遊戲的實踐層面來展示這不可呈現（無意義）的感覺。所以 Lyotard（1984：81）說，後現代美學乃是將現代中所不可呈現的東西彰顯於呈現本身...，不是為了享受樂趣，而是為了呈現一種更為強烈不可呈現的感覺。

總之，符號世界有兩條路：一條是結構之路，其為權力主體（客體）所執行，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異運動，沿著互文差異之序一再宣稱意義在場，並也宣稱了權力在場；另一條是解構之路，其為空白主體所操作，以彰顯真實不能的符號延異遊戲，依著直覺美學之感一再彰顯意義不在場，並也消解了權力在場。前者渴求完滿的在場和終極的真理，卻是踟躕於不可能達成目的的結構道路上，否定、無解、焦慮、消極的再生產；後者欲求無限制的開放空間，而為遊蕩於無限的解構空洞中，肯定、開放、快感、極樂的再生產。

三、資訊社會的解構實踐

前述已說明符號世界的結構和解構之路以及其所體現權力結構的運作機制與解構實踐，然而，權力解構如何出現？其又與權力結構有何關係？事實

上，正是在現代社會生產意義（真實／權力）的結構之路，那真實不能的意義（權力）空隙會浮現出來，並觸動人們轉向消解意義（真實／權力）的解構之途。此過程正是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現代）再到資訊社會（後現代）的形成與轉換，這可由 Baudrillard 劃分的符號發展階段及其描繪的現代到後現代圖像來看。

Baudrillard (1993 : 50) 認為擬像 (simulacra) 有三個歷史上的發展次序，其分別對應於文藝復興以來價值律法的變化：仿造 (counterfeit) 是「古典」時期的主導架構 (dominant schema)，其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生產 (production) 是工業時期的主導架構；模擬 (simulation) 是現今符碼掌控 (code-governed) 時期的主導架構。第一次序的擬像以自然的價值法則來運作；第二次序的擬像以市場的價值法則來運作；第三次序的擬像則以結構的價值法則來運作。

而象 (image) 有四個發展階段：它是基本現實 (profound reality) 的反映；它遮蔽且顛倒了基本現實；它遮蔽了基本現實的缺席；它與任何現實無關，它就是自身純粹的擬像。在第一階段，象是善的顯現 (appearance)，再現 (representation) 神聖的秩序。在第二階段，它是惡的顯現－罪行的秩序 (order of maleficence)。在第三階段，它扮演著顯現－魔法的秩序 (order of sorcery)。在第四階段，它不再是顯現的秩序，而是模擬 (simulation) 的秩序。從符號偽裝某物到符號偽裝無物是一個決定性的轉折 (Baudrillard, 1994 : 6)。

上述意指，Baudrillard 區分了文藝復興以來三個歷史時期的符號運作，且其正對應於當時的價值觀。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的古典時期，符號不被視為符號，而是真實的指稱，它以自然之名運作，仿造真實；工業革命以後的工業時期，符號仍不被視為符號，但它不再指稱自然真實，而是再現社會真實，它以市場之實運轉，生產真實；現今資訊社會的符號掌控時期，符號就是符號，它不再指向任何真實，而是自我指涉，它以結構之序運作，模擬自

己。

所以符號的角色，最初位在神聖的殿堂，披著善的印記，代表著真實。之後，符號的社會性被發現，符號成爲持續社會真實罪行的極惡表徵，反而掩飾和顛倒了真實。再來，符號變成趨向真實的魔法，因其可善可惡的各式顯現，掩飾了真實的缺席。最後，符號與真實斷裂，它不再是任何真實（不論自然真實還是社會真實）的外顯，而是自我指涉的擬像。這是符號從指涉某物到指涉無物的重大轉折。換句話說，Baudrillard 以符號與真實關係的發展，指出了啓蒙以來渴求完滿真實的現代社會運作，其過程是以符號來再現真實的不斷的差異化。而也正是在此符號再現真實的認識基礎上，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異來建構意義（權力）結構的現代社會機制才得以運作。

古典時期社會以自然法則運作，追尋客觀於外之自然真實，因此符號背負著再現真實的神聖使命，作爲仿造真實的良善外顯，這時的符號不是符號而是透明中介，希冀透由符號反映一再接近真實，即永恆之客觀真理所在，即便時而有誤也是人爲偏差，無損於真實存在與符號被賦予的鏡像角色；工業革命以後社會性被認知，其以經濟計算和市場等價法則，追求著客觀於外的社會真實，這時符號已不被視爲透明，且認爲符號不會反映自然真實而是再現了社會真實，甚至，符號生產了真實。

工業革命初期，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本質被揭穿，符號從神聖位置摔落到塵世，符號不是符號而是社會真實的消極性外顯，它成爲再製社會罪行的惡劣象徵，不但維繫社會不平等而顛倒了真實（客觀的社會真實），更以自然化不平等社會的意識形態功能而遮蔽了真實；之後，符號生產真實的角色有了更進一步的發揮，符號不是符號而是社會真實的積極性代表，既可以爲惡也可以爲善，像有魔法般建構著真實，推動著社會變遷之路，並也在這樣建構真實的實踐中遮蔽了真實的缺席（真實不可能）。

以母性的符號（母親的描繪與頌揚）爲例，在古典時期被視爲是女性本

質的反映，但在工業時期，發現其並未反映自然真實的女性本質，而是再現了社會真實的性別關係。起初，它被視為父權社會性別宰制關係的再現（再製），以女性生殖功能和母親角色的突顯，維繫了女性不平等的社會位置，顛倒（遮蔽）了真實（平等）的兩性關係，而它所執行的意識形態功能，自然化了女性與母性的連結。之後，符號被賦予變遷社會的重任，賦權的多元母職詮釋被激發，卻也在望向真實未來（更好的兩性社會）的意義化中遮蔽了追求真實（兩性平等社會）的不可能。

由上可知，Baudrillard 古典和工業社會的符號發展指出了反映、扭曲和建構真實的差異化過程，展現了現代社會之客觀自然真實、客觀社會真實與多元社會真實的認識論基礎及其變遷。

不過，自文藝復興以來一再遙望真實的意義化宿命有了轉變。現今由符號掌控的後現代社會，符號不再再現真實，事實上，它與什麼真實都無關，所以它不是顯現而是擬像，符號不是真實的再現而是符號自身的模擬，它依著符號結構的法則轉動而使符號無限延伸，並也彰顯了那無意義的自由空間。

所以 Baudrillard (1993:2) 說，現今是模擬 (simulation) 原則掌管著我們而非過時的真實原則，我們以這些終極性早已消失的形式維生，不再有意識型態，只有擬像 (simulacra)。

Baudrillard (1993:7) 強調，模擬指的是符號間交換而非符號與真實的交換，符號脫離了需指涉某物的古老責任而獲得解放，它終於變成自由、中立和全然的不確定，且在結構或組合的遊戲中超越了以往確定的等價法則。「模擬不再是有關領域、指涉性存有 (referential being) 或實體，而是沒有原初或真實的真正模型的產出：超真實」(Baudrillard, 1994:1)。而 Baudrillard 所指符號與真實斷裂以至模擬自身的後現代運作，正展現了以符號延異而空洞化意義 (真實／權力) 的解構現象。

但符號為何能從再現秩序進入模擬秩序？社會運作為何從現代社會進入

後現代社會？亦即，以指涉真實來生產意義（權力）的結構化運作為何生成與真實斷裂而空洞化意義（權力）的解構現象？

模擬（simulation）是由模型來生產真實，而這套真實的製造模式，是接續著先前其他相似形式的「擬仿物的秩序」（orders of simulacra）而來的：文藝復興時代的「複本」（copy），保證了正本的真理；工業化時代的系列產品（series）中那些大量製造的物品，並不指涉一正本或參照物，而是在彼此的關係中生產意義。隨著傳播系統和模控學的出現，以及晚期資本主義本身的動力（不僅靠產品來驅動，還透過影像和意義來運作），顯示出「真實」甚至不再消失，而更透過模式和自我指涉的方式，產生出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Horrocks／詹乃璇、周汶昊等譯，2002：17）。也就是說，文藝復興時代，符號是透明鏡，經由正本與複本的區辨，這仿作真實的中介鏡像保證了真實的存在，並在對錯的分辨中一再幻想和追求真實。而到了工業化時期，物品的大量複製導致正本與複本的界線開始模糊：起初，符號變成凹凸鏡，扭曲且掩蓋了真實；之後，符號成爲魔鏡，被賦予建構真實的任務，但不管是飽受批判的凹凸鏡還是寄予厚望的魔鏡，這生產真實的鏡像符號仍負載著真實之期，並在真實消失的懷疑聲中一再想像和建構真實。現今，在晚期資本主義符號消費的運作以及大眾傳播媒介的推波助瀾下，符號才從再現變成模擬，展示了自我指涉而非指向真實，所以真實不是消失了，而是根本就不會存在過，這符號模式的自我延伸所彰顯的空曠無限就是比真實還真實的超真實。

但是，為何大眾傳播媒介和符號消費會造成擬像次序的重大轉折？Baudrillard（1994：79-81）說，我們生活在一個資訊（information）愈來愈多但意義卻愈來愈少的社會。資訊直接摧毀了意義和指涉（signification），或說使它們無效，意義的喪失與資訊、媒介和大眾媒介的消解和除去活動有直接的關係。資訊吞噬了它自身的內容，它吞噬了溝通（communication）和社會。

資訊不再創造溝通，反而是在不斷推展溝通行動中耗盡了它自己，資訊也不再生產意義，而是在意義不斷地展演中消耗了自身。

前述已知，不論是文藝復興時代的仿造真實還是工業化時代的生產真實，符號與真實的連結本來就是虛幻的，亦即，符號其實指向符號，但我們卻試圖將符號指向真實，因為被理性禁錮的心靈堅信正確的終極真理就在不遠，這一再朝向真實的眼界使我們看不見前方空無一物的開放無限，也使我們陷入一再生產意義（權力）的差異化之流。然而，資本主義晚期，符號消費的動力和大眾傳播媒介的複製技術使意義快速轉變，但這不斷產出訊息的差異化之流反而展現了意義生產的無盡、一種不可化約的多樣性，其瓦解了意義的真實宣稱、破壞了結構化意圖的語意延伸。亦即，意義不斷地流轉反而展現了意義不在場，完滿真實的無盡追求弔詭地展示了真實不可能，所以資訊爆炸耗盡了自己，意義（真實）在訊息流轉中內爆了。也正因一再想像真實而生產意義（權力）的結構差異化過程所浮現的意義（真實／權力）空隙（內爆），觸動了埋藏在主體的感覺基因，導引出延異符號而空洞化意義（真實／權力）的解構現象。

Baudrillard（1983）指出：「意義內爆於媒體；媒體和社會內爆於大眾（masses）」。因此我們可以說，前者即為由媒體操作符號差異，而以真實之名生產意義（權力）的結構差異化過程，並在訊息不斷地流轉中意義（非它所願）內爆，但仍在現代社會再現機制下持續以真實之名（再）運作符號差異而（再）生產意義（權力），並同時又再（弔詭地）浮現出意義空隙；後者則是意義內爆而觸動大眾操作的符號轉向，其以感覺之實而從事符號的延異遊戲，成就後現代社會之模擬秩序下空洞化意義（真實／權力）的解構現象。

因此，Baudrillard 所指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再到資訊掌控時期符號與真實的運作，及其所展現古典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價值法律，例證了現代社會以指涉真實來生產意義（權力）的結構差異化運作機制，以及轉

向後現代社會所生成與真實斷裂而空洞化意義（權力）的解構現象。而結構的運作機制與解構的轉向，正是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過程以及資訊社會的轉換與成形。

而資訊社會中的解構現象又可分三種實踐策略

1. 解讀差異痕跡

Derrida (1973: 45) 說，如果擴散 (dissemination) 是潛在的延異，不能被概化為一種精確的概念要旨，這是因為它支解的力量和形式爆破了語義的地平線。擴散雖然產生了無限的語義效果，但卻不能被導引回到一個單一源起的在場、或是一種末世學的在場。它標誌著一種不可化約、生產的多樣性。

解構是解讀意義差異的擴散痕跡，其不在追溯正確的意義，不在指向未來真理的詮釋方向，而是展現意義生產的無盡，這種無休止的差異痕跡就是無中心的證明，也是意義空洞的展現。而解讀意義差異的痕跡展現了權力差異的軌跡，不僅彰顯意義背後的權力性質，更透由權力綿延不斷的軌跡而拆解權力鬥爭的無效，進而得以指向無意義所在的無權力空間。

以健康論述為例，現代醫學（或稱西醫）以特定學術、醫療機構以及知識產出的方式，生產著具真實位階的健康詮釋，規約著人們的健康實踐途徑，並在追求「健康真理」的過程中，以科技精進和知識累積的科學認知原則持續互文差異化健康論述。於是，在科學技術不斷演進、精密儀器持續創新、合法醫療機構倍增，以致健康知識推陳出新的過程中進入了資訊社會，而在傳播媒介（尤其是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和近用普及中，非西方醫學的民俗療法和常民經驗等另類健康詮釋也紛紛浮出檯面，又在網路郵件轉寄、搜尋引擎超連結、大眾媒介轉引的推波助瀾下，造就了四處流竄且快速轉變的健康資訊流，於是，人們在多元矛盾的健康符號世界裡看見了健康意義的擴散痕跡，終極健康途徑的信念開始動搖了；人們更在健康意異流的真實宣稱中領悟了真實不可能，永恆健康真理的追求也開始遲疑了...。

2. 解構閱讀

Derrida 區分了兩種閱讀，一是傳統的閱讀，一是解構的閱讀，前者指向文本的可讀性、可理解性，後者相互於文本的不可讀性、可寫性，第一種是重複性閱讀，後一種是批評性閱讀，這兩種閱讀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有互補性的。(楊大春，1996：171-172)。

什麼是傳統閱讀？當我們解讀時，其實也在表意（再詮釋），我們總是在表意中讓意義互文差異化，總是使文本不斷增生，愈讀愈多。而此持續編織增生的閱讀就是傳統閱讀，也是一種重複性閱讀，因為它是一再被延遲又一再固定意義的企圖，也是意義（權力）結構再生產的實踐。

解構閱讀又是什麼？Derrida（1976：158、163）認為，一個解構的閱讀通常是朝向一個必然的關係，不被作者所感知的關係，就在作者所使用的語言模式所要求的和並未要求的之間，這關係是...批判（解構）的解讀所應生產的表意結構，這是在看見中創造沒有看見的生產企圖。(cited from Storey，2001：88)。因為 Derrida（1978：284）說：「語言於其中背負了批判自身的必須性」。

解構不是順著精進與完滿意義之期持續參與編織，而是以新的閱讀方式翻轉意義洋流，那就是呈現意義網中的空白，那個使意義編織增生的空洞，這空洞就是傳統重複閱讀中的空隙，也是文本自身的敗筆。解構閱讀就是在自認完滿的解讀中尋找不完滿的裂縫，就是找碴，就是誤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你的詞彙來找出你的解釋中所不能解釋的，找出你的解釋中已說出但你自己卻不知道的，找出你的解釋中沒有說出卻存在的，總之，就是把你的解讀搞的歪七扭八、完全不順，而它其實是在文本中早已存在的。解構的閱讀讓人看見文本中有一個批判自身的裂縫存在，讓意義空洞自我顯現出來。

例如玩弄語言的現象，在大眾傳播媒介主導的資訊社會中一發不可收拾，從早期以切割詞語來造句的「白癡造句法」，如「差不多」－鄉下地方郵

差不多、「難過」—馬路車多很難過；到因應電腦中介傳播而簡化或轉化文字的注音文、錯別字和顏文字，如「放棄ㄉ咩」、「好器」、「Orz」、「>"<」；以及在網路普及化下所迸發的語言玩弄風潮，包括諧音、合併音、隱喻或轉喻、古字創新、kuso 詮釋，如諧音—「紅豆泥（真的嗎）」「3Q（thank you）」、合併音—「就醬」、「踹共」、隱喻或轉喻—「潛水艇（沒水準）」、古字創新—囧、kuso—「你是天使（天哪！讓我死一死吧）」「真是個天才（天上掉下來的蠢材）」、「真可愛（可憐沒人愛）」等，其不僅在網路中流竄與延伸，更取代了原始書寫或意義而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如公視談話性節目「爸媽囧很大」。

然而，不論是注音文、錯別字、顏文字或是諧音、合併音、隱喻或轉喻、古字創新，都是傳統閱讀下的編織增生，因為它們是沿著舊有文字圖像或聲音規則的互文轉換，但也正是在語言符號的互文延伸中，人們才能看見語言的無限可能性。不過，在這股語言玩弄風中，白癡造句法和 kuso 詮釋卻屬解構性閱讀，因為它們不是順著舊有的音形規則持續參與編織，而是尋找意義裂縫並從中稜接新枝，使原有的語言架構和延伸路徑傾倒歪斜，並也彰顯出語言符號既存的意義空隙。

3. 解構遊戲

Derrida（1978：292）說，遊戲（play）與歷史存在著緊張，遊戲與在場也存在著緊張，遊戲是在場的斷裂（disruption）。有兩種對詮釋（interpretation）、結構、符號和遊戲的詮釋，一種追求解譯（decipher），夢想解譯逃離遊戲和符號秩序的真理與源起，其活在解釋的必須性並視之為流亡；另一種則不再朝向源頭，它肯定遊戲並試圖超越人與人文主義、那個所謂人的存有，這存有在整個形上學或存有論歷史中夢想完滿的在場、保證的基礎、以及遊戲的源頭和終極。也就是說，遊戲有兩種：意義化的遊戲，它追求不受符號污染的事物本質，它找尋完滿的在場、理想的圓滿、終極的真理。這意義化的遊戲，其實不是遊戲，因為，它的眼光、動機與目的是理性

嚴肅的，是爲了意義永遠固定的本質真理；意義空洞化的遊戲，它不再尋求終極的完滿或源頭，而是反過來展現完滿中的裂縫。這意義空洞化的遊戲，才是遊戲，因爲，它的眼光、動機與目的是開放玩樂的，是爲了體驗那空無一物的樂趣。

所以 Derrida (1981: 14) 說，敢於無所指涉就是開始遊戲，首先，參與延異的遊戲，其防止任何字詞、任何概念、任何重要的闡明從神學中心的在場來概括與支配差異的運動和文本的空白。

援引前例，也正因健康意義的擴散痕跡反而弔詭地彰顯出健康真理不可得，觸動了人們體內的感覺基因而操作健康符號的解構遊戲，於是，網路空間開始出現大量玩弄真實符碼的親眼目睹、實際經驗等健康資訊遊戲，如一則以親友親身經歷而言之鑿鑿的衛生棉有蟲卵以致切除子宮的網路訊息，隨著網路大量轉寄甚至引起恐慌，最後透由新聞報導醫學專家說法才得以平息，然而，健康資訊遊戲仍游走於健康意異之流，假真實之名行破壞真實之實。不過，資訊社會形成並不代表工業社會消失，事實上，模擬秩序與再現秩序背反同存於後現代社會，並且相互吞併與包覆。所以，Baudrillard (1994: 6) 說，再現藉由視模擬爲虛假的再現而試圖吞併模擬，模擬則將整個再現組織視爲擬像而予以包覆。

換言之，指涉真實的意義（權力）機制會（再）啓動，將延異空洞實體化，讓符號再偽裝真實，落入意異化之流，持續再生產意義（權力）。而延異美感也持續遊走穿梭於意異之流，彰顯埋藏於意義化機制中的延異空白，以（再）體驗玩弄戲耍的快感。

援引前例來說明：因此衛生署常透由新聞稿澄清網路傳言，新聞媒介也常轉引或查證網路流傳的健康資訊，甚至設立通報管道和機制專責查證網路訊息，然而，不論是誤將健康資訊遊戲當成真實事件來報導、或是斥之爲虛假的網路謠言、又或是視其爲網路虛擬文化，都是意義化機制以再意義化而

吞併無意義（反真實）空洞的實踐。不過，健康資訊遊戲也滲透於川流不息的健康訊息中，像黑洞般以其真實之姿試圖侵蝕並吞噬健康醫學的真實牌坊。

四、結語

資訊社會是權力鬥爭的戰場。此權力競技場乃由權力主體／客體（媒體或大眾）所執行，其以宣稱真實的符號差異來生產意義（權力）結構，並在不圓滿的裂縫中，又再度尋求圓滿，就在一再填滿裂縫的圓滿（真實）催促中，意義（權力）不斷互文差異化。雖然差異化過程會浮現非它所願（一再被隱匿）的意義（真實／權力）空隙，但仍在意義（權力）差異化的結構之路，並持續以指涉真實的符號差異再生產意義（權力）。

資訊社會也是符號滿溢的空間。此隨機資訊流則由空白主體（大眾）所操作，其依感覺美學的符號延異而空洞化意義（真實／權力），即不再尋求圓滿或源頭，而是展現圓滿中的裂縫、反過來宣稱意義（真實）不在場，並在一再呈現裂縫的感覺催促中，成就符號差異化（純粹差異）的解構之途。

不過，資訊社會中活躍的權力鬥爭和權力流動不是權力的解放，而是總體性權力管治的（再）生產；資訊社會中無意義的資訊流也非由冷冰冰的資訊機器所掌控，而是由大眾依感覺操作，以符號延異遊戲來空洞化意義（真實）並解放權力的解構實踐，且此空白主體的符號延展所展示的不是無機的生化世界或是符號恣意橫流的墳場，而是充滿感動與歡愉的活生生世界。

¹ Derrida (Sim, 1999: 33-34) 藉由劃掉 (erasure) 來表示與對手使用相同的語詞，並又同時否認它們負載了相同的意義。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江靜之譯(2003)。《網際網路的衝擊－網際空間與網際網路的文化與政治》。台北：韋伯。(原書 Jordan, T. [1999] . *Cyberpower-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yberspace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何乏筆等譯 (2006)。《傅科考》。台北：麥田。(原書 Gros, F. [2004] . *Michel Foucault*. France: France University Press)

蔡錚雲 (2006)。《另類哲學：現代社會的後現代文化》。台北：邊城。

唐士哲 (2005)。〈在速度的廢墟中挺進：電子媒介新聞的唯物批判觀點〉，
《新聞學研究》，84:79-118。

謝清俊 (1992)。〈資訊社會與倫理〉，《新聞學研究》，46:1-15。

詹乃璇、周汶昊譯 (2002)。《布希亞與千禧年》。台北：果實。

(二)英文部分

Anderson, N.A.(2003). *Discursive analytical strategies: Understanding Foucault, Koselleck, Laclau, Luhmann*. UK: The Policy Press.

Baudrillard, J.(1994).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Baudrillard, J.(1993). *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London: Sage.

Baudrillard, J.(1983). *In the Shadow of the Silent Majorities*. New York: Semiotext(e).

Derrida, J. (1981). *Position*.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Derrida, J. (1978). *Writing and dif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Derrida, J. (1976). *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 MA: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73). *Speech and phenomena, and other essays on Husserl's theory*

of signs. Evanston, IL: North 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Deleuze, G. (1998). *Foucault* (5th 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ucault, M. (1983). The subject and power. In H. C. Dreyfus & P. Rabinow (2nd Ed.) (Eds.). *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pp. 208-22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Brighton: Harvester.

Hall, S.(1997)(eds.). *Representation —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Sage.

Lyotard, Jean-Francois(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inneapolis: Minneasota University Press.

Lyotard, Jean-Francois(1971). *Discourse, figure*. Paris:Klincksieck.

Sim, S. (1999). *Derrida and the end of history*. Cambridge: Icon Books.

Storey, J. (2001). *Culture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The practice of deconstruction in information society Perspectives according to Derrida, Foucault and Baudrillard

Ping-Chun Li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ractice of deconstruction in information society with Derrida's discussion of differance, Foucault's notion of power, and Baudrillard's analysis of image as it evolves from the modern to the postmodern society.

It argues that the message flow in information society presents the differentiated operation of meaning (and power) structure. This structure is (re)produced with the consistent claiming of reality carried out by social subject. Nevertheless, the active struggle and dynamics is not equivalent with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social subject from the subjection of power. In effect, it (re)produces the relationship of powerful governmen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phenomenon of deconstruction, in which meaning (and power) is emptied out in order to declare reality is impossible. Therefore, deconstruction is a game of affirming emptiness. Its play with "the symbol"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meaningless constitutes its tactics to undo power in information society.

Keywords : Derrida · Foucault · Baudrillard · Deconstruction · Power · Information Society